



一座城市的記憶，不只在建築與街道，也在人如何移動、如何抵達。從巴士的站牌到渡輪的碼頭，從陸路的车廂到海上的甲板，香港人走出來的路，就是這座城市發展的縮影。當巴士路線不斷延伸、渡輪航線一條條消失，我們移動的方式一直在變，人與地方之間的關係也在變。而記錄，就是為了在改變之中，留住那些曾經連結的痕跡。

●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：受訪者及商務印書館提供



● 約1958年由波斯富街東望軒尼詩道，右下方為一輛來往灣仔碼頭及柴灣的8號線白水箱巴士。書內插圖



● 約1972年由登打士街北望彌敦道，可見兩部駛經波油街的Regent五型巴士。書內插圖



● 1958年的中環干諾道中，可見客車渡輪「民恭號」。書內插圖

勾勒香港城市發展縮影

一。十。年。收。藏。

掌故專家梳理海陸交通百年變遷



● 鄭寶鴻對香港海陸交通均有特殊感情，匯集歷史照片成書。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



● 1961年，皇后大道中的一輛大型單層5號A巴士剛駛過皇后戲院前。書內插圖

香港歷史專家、收藏家鄭寶鴻花了逾20年時間，翻閱1870年代以來的多份報紙與政府文獻，從自己收藏的老照片中細心甄選，編纂成《香港巴士百年光影——從公眾電車、街坊汽車到巴士》及《香港海上交通百年光影——從寫船館、汽車渡輪到天星碼頭》。他在兩書中以珍稀影像把海陸交通與人的連結一一記錄下來，為這段承載城市記憶的交通發展歷程作一圖文並茂的歷史註腳。

一段褪色的海上日常

「以前由中環去深水埗，要搭半個鐘船。」當年，居於港島的鄭寶鴻常與家人往九龍探親訪友，在統一碼頭搭往深水埗、旺角及佐敦道的小輪，最佳節目是在客車渡輪觀看汽車從渡輪登岸的情景。這些曾經的日常，對不少香港人來說，如今已十分陌生。

正如書名中的「寫船館」，在十九世紀是香港人出遠門的必經之地。「以前我們乘搭大洋船，要去寫船館寫票，預訂船位。」鄭寶鴻解釋，那時出遠門是小事，加上識字率低，許多人不諳英文，難以自行處理船務，船務代理便應運而生。後來，預訂或購買船票可由船公司直接辦理，逐漸取代了寫船館的角色。

他翻開書中的老照片，指着一張1950年代明信片說：「這艘民恭號1930年代已經有了，服務香港多年，主要行走中環至佐敦道航線。」他記得1950年代中，母親獨自往廣州探親，他凌晨時分在卜公碼頭目送母親登上電船仔，往尖沙咀搭火車。當時的干諾道中海旁除卜公外，還有鐵行、德忌利士、敵產、大業公司等數十座碼頭，供大洋船、港澳渡輪及電船仔停泊，後來隨着1950至1960年代的填海工程，相繼被拆卸或淹沒。

對鄭寶鴻而言，搭渡輪有苦有樂。有時在海風中看海景，心情舒暢；有時要等船，有時擁擠，這班趕不上，只能等下一班。但這些等待與擁擠，如今想來，都成了值得回味的日常。

渡輪退場 社區也在變

「1960年代是渡輪的黃金時代。」當年海旁最高的樓宇——中華總商會大廈仍矗立於干諾道中，而一個個碼頭、一條條航線，則隨着海底隧道及過海鐵路通車而式微，直至消失。

海上交通不僅是連接港九的運輸命脈，更是承載數代市民集體記憶的時光航船，航線的每一次變動，都影響着市民的生活和社區的生態。鄭寶鴻以佐敦道碼頭為例：「佐敦道昔日設有油麻地小輪營運的渡海小輪碼頭及汽車渡輪碼頭，即如今的佐敦、渡船角一帶，以前好繁盛。」他記得，以前工作時試過一日搭四次渡輪去佐敦道，如今一年也未必會經過那裏一次。



● 約1935年的尖沙咀，可見九龍倉、天星碼頭、火車站等。書內插圖

道譯有道 城市有聲

鄭寶鴻花了數十年，從舊報紙與文獻中打撈香港海陸交通的百年變遷；翻譯研究者兆元Tera（李俊儀）則從另一條路徑打撈文化記憶——那些我們每天掛在嘴邊、卻從未細想的街名。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語言，不是口耳相傳的話語，而是刻在路牌上、印在地圖裏、藏在門牌號碼背後的文化邏輯與身份認同。她說，「道」是道理，因這些名字背後藏着譯者的心思；「道」更是娓娓道來，將這些故事逐一講給讀者聽。

● 兆元Tera揭本地譯名背後的文化邏輯與社區連結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攝



兆元Tera的新書《道譯有道——藏在譯名裏的香港故事》以譯者視角，解讀香港街道、建築、器物名稱背後的文化邏輯與身份認同。她說，「道」是道理，因這些名字背後藏着譯者的心思；「道」更是娓娓道來，將這些故事逐一講給讀者聽。

整本書的起點，是大角咀的「詩歌舞街」。這條街的英文名是Sycamore Street，Sycamore意為無花果樹或梧桐樹。兆元Tera考證過地政總署的記錄，確認此街1950年定名時，譯者沒有選擇直譯，而是取了中文「詩歌舞」三個字，將音韻與用字的雅致做到極致。「譯者非常有心思，也很貼合嚴復提倡的『信達雅』翻譯理論。」更讓她觸動的是，70多年後，這一帶真的建起了許多

學校，漸漸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氛圍，「前人種下的種子，後人真正將它內化甚至實踐了出來。」

另一個故事，是中環石板街的正名「砵甸乍街」（又稱砵典乍街）。這個名字取自第一任港督Henry Pottinger，兆元Tera稱，Pottinger的譯名原來有三個版本：除了延續至今的「砵甸乍」，還有帶諷刺意味的「煲煎茶」，以及蘊含溫文爾雅之意的「璞鼎查」。「譯名除了在音韻上要對應，其實背後也有很多巧思和故事，映照出那個時代的精神和價值取向。」

一個名字的取捨，往往不只是翻譯的技術問題，更是一場關於如何理解一個人、一個時代，以至一座城市的角力。「名字就像語言的化石，前人留下來的我們可以去考究，我們也可以埋下一些新的種子，讓後人去考究。」她說。

從詩歌舞街到砵甸乍街，每一個名字都是時代留下的註腳。而我們這一代人，或許也正在為下一代留下新的名字。

觀點 「蝕錢也要做，只因不想下一代忘記」

鄭寶鴻早年曾拿着相機，記錄幾十年間的街頭變化。起初只是拍舊戲院、茶樓和那些即將拆卸的景點，後來不滿足於當下的記錄，開始尋找更早期的影像。他至今已收藏上萬張歷史照片，翻閱報紙、爬梳史料，一摞摞分門別類的筆記簿，幾乎都已出版成書——除海陸交通外，亦涉及貿易、金融、工業、飲食、娛樂、旅遊等。

他買相片的標準很簡單：或許將來寫書會用得到。「一開始收藏舊相片，沒

想過會出書，後來才有系統整理的想法。」他笑說，出這些書「根本每本都蝕好多錢」，許多照片都是自己真金白銀買回來的，有些甚至幾千元一張。但他仍然繼續做。一方面希望多人透過這些記錄去研究香港歷史，另一方面，很多事物已經消失，年輕人從未聽過。他想把這些消失中的景象，留給下一代。

「就是想保存些歷史而已。」這句話說得輕，背後卻是數十年的堅持——一份不問回報、只問值得的執着。



● 鄭寶鴻已出版多本本地歷史文化書籍。資料圖片